

论美丽中国的文化镜像

——兼论文化赋能建设美丽中国

李培超^{1,2},熊艳²

(1.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2.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建设美丽中国不是单纯的技术工程,更是重要的文化建设目标。美丽中国在深层次上折射为一种文化镜像,内蕴着自然生态之美、绿色发展之美、民生福祉之美与和谐世界之美等多重内涵。首先,自然生态之美根植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传统生态智慧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文化根基,需通过创造性转化,使其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活力。其次,绿色发展之美依托于当代生态文化的培育。通过绿色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变革,生态文化成为美丽中国的时代标识,引导社会形成全民生态自觉。再次,民生福祉之美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公众参与,推动美丽中国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事业。最后,和谐世界之美彰显了中华文明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文化贡献。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仁爱和平”等理念,通过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智慧。文化赋能为建设美丽中国与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互补互动的实践场域,使美丽中国建设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新转化、当代生态文化的培育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推动发展、人类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形成了彼此支撑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美丽中国;文化镜像;文化赋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1]。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更需要文化全面赋能。美丽中国之“美丽”不仅仅是一个描述自然风光的“薄概念”,而是承载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因

此,建设美丽中国与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应该是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的。

一、自然生态之美与传统生态智慧的涵育传承

自然生态之美是美丽中国最具有显示度的内容。然而,它不仅表现为一种物质映像,更具有醒目的文化语义——既需要通过文化来审视、维护和增进,也启迪了文化的产生和延续。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自然生态之美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的独特“景象”。在人们的惯常思维中,自然生态之美似乎只是指纯粹

引用本文:李培超,熊艳. 论美丽中国的文化镜像——兼论文化赋能建设美丽中国[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27(5):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重大项目(23JJD710004);第三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25JGZD0132)

作者简介:李培超(1966—),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E-mail:947232994@qq.com

的自然景观,这种美是客观的、静止的,不掺杂人为因素,体现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生态的客观属性。但实际上,自然生态之美是无法离开人的参与而存在的,它始终被人类历史所接纳、被人类文化所烛照。自然性和人文性是构成自然生态之美的两大要素,二者相互支撑、相互融贯。

自然生态之美具有客观性。自然生态之美的客观性就在于生态环境自身的“美丽禀赋”,这指的是其天然的生态环境结构或者说生态环境的内在性。但是,生态环境的“美丽禀赋”只是构成自然生态之美的一个条件,而并不是全部,因为只有通过人的参与,自然的“美丽禀赋”才会得到现实地“绽放”。也就是说,自然生态之美的客观性是需要被发现的,更是需要被保护和增进的。而发现、保护和增进原初的自然生态之美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文化沉淀和凝练、升华自然“美丽禀赋”的过程,也是文化作用于生态保护的功能实现过程。从根本上说,自然生态之美本身体现的就是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

人与自然的交往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展开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自然通过人的活动进入人的历史,成为参与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活力元素,渗透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而对自然的审美就是自然参与人类文化建构的过程,即自然不断获得人类文化的建构或者说为人类文化所赋意,这就是“自然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人也会主动参与自然的演化过程,影响并不断改变自然的原初状态。人虽然是在自然界中完成“人猿揖别”的,是自然界中的一员,但却以自己的独特本质规定和存在方式超越了动物性——不仅通过观念和思想反映世界,更是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自然界,这一过程也即“人化自然”的过程。“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是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也是人建构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过程,即自然之美转化为人文之美的过程,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同构状态。这一过程或状态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人与自然可以保持同一性或和谐性,但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激烈矛盾,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性状取决于人如何认识自然、

认识自身并以何种方式作用于自然。这也说明,自然生态之美从根本上说是无法完全摆脱人的历史文化而独存的,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中国的生态环境是拥有“美丽禀赋”的。中国的国土空间广袤辽远、类型多样,既拥有地质地貌多样性,又拥有物种多样性,这必然造就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自然生态环境“自带”的这些内在特征是可以通过各种实证性材料来佐证的,而且,在自然界中,多样性是保持自然生态“美丽禀赋”的重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在中国可谓绵长悠远,因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这意味着中华民族与自然打交道的历史是悠久的,对自然进行文化建构的时间也是漫长的,支撑文化和文明延续的自然机制始终没有崩解,这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是密切相关的。从起点上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文化和文明形态都与农耕活动密切相关。在农耕条件下,人们长期与自然交往,“靠天吃饭”既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也培育了对大自然的情感,因而积淀了丰富的刻写自然之美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不仅是对自然生态属性进行的审美加工,而且在调节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产生发展都需要具体的自然机制的支撑,大自然在中国文明和文化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文化和文明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文化和文明内涵的精神元素。中国古代的许多艺术形式都打上了“以自然为师”的印记,由此形成了以临摹或升华自然韵致为母题的各种具体文化形态。传说仓颉就是通过“仰观奎星园曲之势,俯查龟文鸟羽山川”才创造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因而“山”字形同峰峦、“水”字酷似流波……自然之神韵在文字形态的架构中笔缕尽显,由此人尽可“望字得意”“观字得蕴”。而且,这种“造字”风格直接成就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标准,人们时常用“鹰望鹏逝、游鱼得水、景山兴云”“云鹤游天、飞鸿戏海”“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笔走龙蛇、自然成趣”“惊蛇走虺、骤雨旋风”等辞藻来赞誉书

法家之功力。此外,中国的绘画与书法自始就融为一体,有“书画同源”之说。中国古代山水画和花鸟画既重形似,更重神似;既重“写实”,又重“写意”,力求在人与自然融合为一的基础上创造美的意境。山水诗文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学门类,通过对古道西风、夕阳西下、烟雨苍凉、青山依旧、泰山秋水、纵浪大化、鱼跃鸢飞、荒天古墓、风日流丽、听泉眠云等主题的咏吟,表达了人对大自然依顺、敬畏和以书写自然来排解离愁别绪。中国古代的其他艺术形式也都打上了自然对人进行“美育”的印记——音乐肇始于对天地和合的感悟;建筑、园林艺术体现大自然气势恢宏、有机衔接、均衡统一的特点……总之,对自然生态之美的深刻认识和体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觉解,这种深刻觉解凝结为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不仅在生活实践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为支撑文明发展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机制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历史越是漫长,对自然的利用和干预就会越多,而自然资源的再生性总是与人口增殖、人力破坏等因素难以保持平衡。在人与自然关系演进过程中,自然力和人力都会影响自然生态,而人力则是改变自然状态的最主要的因素,这也说明,尽管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但仍难以完全化解因诸多人为因素导致的生态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战乱影响和对环境疏于治理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更使得环境问题不断累积,对自然生态之美造成了一定破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3]7}“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3]8}美丽中国建设既要努力修复遭到破坏的自然生态,使其重新展现美丽“容颜”;又要努力增进自然之美,使得祖国的自然风光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从历史和文化建构自然的视角来看,抓好这两个方面要重视文化赋

能,特别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创新转化利用。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4]30}。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了许多“前科学”的认识和判断,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而是应该结合现实需要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得美丽中国的自然生态之美与中华人文精神相互映衬,既增添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文化厚度,也增加其人文精神的温度。

二、绿色发展之美与当代生态文化的培育弘扬

美丽中国建设不仅承接历史,更立足当代并着眼未来。推动绿色发展不仅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动力机制,更是展示当代文化底色的主要方式,成为推进当代文化创新、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的强大动力机制。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通过绿色发展才能实现。人总是通过改造自然不断优化生存发展的条件、产生新的需要并形成更为强大的认知与实践能力,从而推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不断发展到新的阶段。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不是人对自然完全顺应的“臣服”状态,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饥则求食寒则求暖”的生活节奏,也不是建立在人力完全压制自然力的基础上,企图通过对自然界完成彻底的“祛魅”来榨取自然,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动态的、历史的,而不是固定的、僵滞的。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人与自然“互塑”的过程。一方面,人可以“塑造”自然,使自然发生合乎人的需要的改变,在“塑造”自然的过程中,人能够将自己的价值心理和审美情感对象化、具象化;另一方面,自然也可以塑造人,使人产生体现自然客观性的变化,无论是形体、肤色还是文化、性格、心理特征等。这种“互塑”能够使人力和自然力之间保持一种“友好型”状态。三是人与自然

的和谐要通过人的主动作为才能够实现,即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三方面,立足于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要求,推动绿色发展是必然选择;即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和谐,需要通过绿色发展才能实现,且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生态问题和所遇到的新的生态问题,也必须通过绿色发展才能够完成。通过野蛮地征服自然来求发展和像动物一样完全靠本能适应自然的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符合建设美丽中国的客观要求的。

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其中蕴含着当代文化变革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4]133} 当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首要应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生产方式转变。绿色是生命的象征,也是大自然的本色或底色,保护好绿水青山不仅是守护好大自然的内在属性、增强大自然对生命的托载能力、更好地养育与呵护生命,也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是充分总结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和人类发展方式转变的应然趋向而作出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科学论断。改善环境、保护环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这是因为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带动文化的创新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必然会带动文化的创新发展。作为传统生产力在科技创新取得飞速发展背景下迭代突破而形成的一种新质态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成果。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持,这包括了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导向及劳动者素质优化等,从一定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内含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会通过对时代重大问题予以靶向关注而为文化发展注入动力、护航引领并标注上时代印记。而推动绿色发展既是新质生产力内涵和效能的体现,又是新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风向标。

最后,绿色发展必然带动生态文化的繁荣

发展,从而为美丽中国建设打造时代文化标识。生态文化是在生态问题成为时代性问题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化仅仅是一种新近出现的文化现象。既然人与自然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一种永恒的关系,那么对自然、生态抑或环境问题的思考就具有悠久的历史并蔚成一种厚重的文化传统。然而,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与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是有本质差别的: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被看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征服者与征服对象之间的关系、使用者与使用物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带有原始自然崇拜意义上的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关系等;步入生态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被定位为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科学认知与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的,生态文化不是传统的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思考、定位的简单延伸,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其中也包括对传统思维的纠偏或激活。而无论是重新思考、定位或者纠偏、激活,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培育体现时代精神风貌的自然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

人与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或物质生产方式向多方面延展的,人与自然关系延展的范围或向度取决于人的发展模式及由此形成的需求状态、认知能力和价值取向等。可以说,人是如何生产或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性状就是什么样的。当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只停留在无限度地获取满足物质需要的层次上,与此相对应,人对自然的认知也会停留在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层面,自然价值观也必然会导致向征服自然或掠夺自然的维度,“罢黜自然”会成为社会文化的主题。而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绿色发展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寓意着生态元素通过人的活动已经全面进入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已经成为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守的底线原则,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设计而统合到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生态文化因此获得了强大发展动力,重建自然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成为培

育、弘扬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就明确提出,要“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培育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加快形成全民生态自觉。”^[5]

价值不是一个实体性范畴,而是一个关系范畴,即任何价值都是在关系中产生的,而不可能由事物自身生成,也不表现为事物自身固有的某种属性。生态价值也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成的,其本质是人对于其自身与自然关系应然状态的一种观念性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并展开的,实践方式不同,人与自然关系状况就不同,对自然价值的认识即自然价值观也就不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表现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自然的价值仅仅体现为满足人的口腹之欲的资源,因而一些传统的自然价值观只认同人对自然的单向的作用力,而否定或弱化自然对人的影响力,甚至忽视人破坏自然可能遭到的“报复”;只认同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意义,而否定或贬低自然的生命意义;只认同人的需要的合理性,而忽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只认同人的生活的复杂性,而忽视自然生态系统的系统性等。这种传统的自然价值观在人与自然关系通过绿色发展得到了重新调整,继而形成了一种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新的自然价值观:

第一,在人与自然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前提下来确定自然的价值和意义。“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4]225}。自然作为生命之母,对所有生命都有孕育养护之功。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形式,相对于其他非人类生命形式而言从自然中获取更多,因为人不仅在维持肉体需要的层面上依赖自然,而且在心理和精神生活的层面上也依赖自然,自然对人的生命托载是全方位的,这是自然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体现。因而人对待自然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而不能贬低自然、疏离自然、榨取自然、破坏自然。人与自然同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意味着双方存在着荣辱与共的关系或者说是“彼此成全”的关系:若人类善

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若人类破坏自然,自然也会威胁人类生存。因此,从人与自然同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角度看,自然对人的价值和意义还在于通过唤起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使人的实践活动更趋向合理,人的生命活动更充实、更全面。

第二,在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来把握自然的价值和意义。自然界不是人类生活的附属物,大自然有其存在的独立性和规律性,人类可以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但不能改变自然规律或取消自然规律,所以评价自然的价值也不能完全局限于人的尺度,在超越了人的尺度的基础上来判定自然的价值更体现出人相对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超越了自身的肉体需要或者在不依从于肉体需要的基础上与自然进行交往,才能够进行美的创造,这正是人的生命特质的表现。

第三,在人向自然而生的生活追求中来体悟自然的价值和意义。从征服自然到向自然而生,这是人的生活或生命境界提升的标志:首先,向自然而生就是人的生活世界充分向自然敞开,全面充分地接纳、内化自然,让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与自然融为一体、诗意地栖居成为美好生活的判断标准,这也是自然价值和意义的重要体现。对人类来说,与自然对抗或疏离的生活状态只意味着“活着”,但不是真正的“生活”。其次,向自然而生是在保持自然界完整性的基础上对自然的依赖或归依。即,人通过自然的完整性成就自己生命的整全性。“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7]173}最后,向自然而生是把自身向自然的全部托付,这就需要大自然是丰富的、美丽的、稳定的、和谐的,不仅有稻浪翻滚、碧水清流,而且能承载

人的乡愁、抚慰人的心灵。

第四,将树立生态道德观作为培育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生态道德观在内涵上属于自然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侧重于从伦理道德的视角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视作一种道德关系,树立生态道德观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唤起人对保护大自然的道德义务和尊重大自然的道德情感,来规范或调整对待大自然的行为方式并把保护自然内化为人的道德意识。生态道德观体现了一种新的道德评价标准或人生价值坐标。传统道德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来确定人的行为正当性,道德规范也是用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并不属于传统伦理道德思考的对象,也不是确定人生价值的基本参照。而随着人对自我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逐渐成为审视人生价值意义的重要坐标,特别是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自然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被充分挖掘出来,人的生命内涵和价值实现方式获得了新的定位:人不仅是社会之子而且也是自然之子。因而,人必须把道德义务和道德情感投射到自然之上,使道德成为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借助道德因素的介入,美丽中国建设将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7]¹⁷³

总之,以加快绿色发展来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仅意味着物质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巨大改变,还意味着为体现时代风尚的生态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绿色发展和生态文化创建在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实践中相互促进,鲜明地展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动力机制和时代特征。

三、民生福祉之美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美丽中国之“美丽”不仅具有历史文化内涵、时代文化风采,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的语境中还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本质内涵:民生福祉是美丽中国最深沉的美。这种最深沉的美是对美的内涵的深度呈现,是对美的发展规律的遵循,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内核。

从源头上看,美并不是以人的闲情逸致为前提的,美是有现实生活基础的。因此,美有具体的实质内涵,并不能纯粹归结为某种虚幻的不可捉摸的人的主观体验。“美是人在劳动实践中向人生成的,是对人而存在、为人而创造的,并且作用于人,推动人的认识和实践创造。它的基本功能是造就美的人和美的社会,即通过非强制性的审美创造美活动,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熏陶,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和社会。”^[8]这说明,美并不排斥百姓日用,也不离人间烟火;美是体验,更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创造美比体验美更为根本。总之,美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可分割。“美好生活”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的生存状态或生活状况直接影响了其对美好的想象和期望,对美好生活的持续刻画也反映了人的生活状态的历史变迁。进入新时代,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就必然与解决民生问题直接对接,增进民生福祉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目标,这也构成了建设美丽中国最重要的实践动员和根本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9]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也正是在为增进民生福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其中有些工作涉及具体领域,有些工作则带有全局性与根本性,涉及全社会的动员、参与和引导。

从具体领域和层面来看,发挥部门管理和调控作用或者通过技术的介入是建设美丽中国、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一是要全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在良好的生态

环境中生活,通过提高生态质量来直接提高生活质量。现阶段,人民群众生活得好不好,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要看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如所栖居家园的生态环境质量高不高、所需要的生态产品能否得到充足供应。“美丽中国就是要使祖国大好河山都健康,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健康。”^{[4]273}二是要重点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4]16}

从全局性、根本性的视角来看,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赋能作用,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质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论断。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发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的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建设美丽中国是同频共振、相互印证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极大地带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能够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并从中获益;建设美丽中国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动力支持、实践场域和社会发动,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容纳时代要求而发展成崭新的文化生命体,重建人的意义世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价值空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赋能美丽中国建设,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价值理念:“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4]11-12}

四、和谐世界之美与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建设美丽中国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美丽中国建设是推动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实践力量,也是推动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从美丽中国到和谐世界,

体现了美的同质性、连通性、扩展性、共享性,因为世界之和谐即为世界之美丽。

自有人类以来,他们的生活足迹便开始广布于世界各地,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随着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作为利益实体和权利主体的国家更加自觉地建构自己的利益链条、文化谱系和价值立场,逐渐形成了差异性和多元性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格局。但是,这诸多差异和多元性的存在都改变不了一个客观事实——人类都共同栖居于地球之中或者说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正是由于这一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都无法消解人类共同的生存忧患或生态关切,而且由于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包含着生物多样性的整体结构,其平衡机制一旦被打破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区域性的生态破坏也会引发或加剧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就印证了:“生态危机无国界”。同样地,如果区域性的生态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那么对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必然会产生实际性的积极影响。因而,从美丽中国到和谐世界并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延伸,而是生态规律的客观体现,无论从生态破坏的全球性效应还是从和谐世界建设的全球性影响来看,人类都应该秉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中国作为世界上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巨大、文明积淀深厚、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中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列、世界的前列,对全球产生的示范性和带动性毋庸置疑。“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10]从美丽中国到和谐世界,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彼此之间的通达

和接纳仍然需要文化的赋能。前文已述,受具体环境的制约,人类文化和文明有不同的源头,也有不同的走向,国家之间的冲突不断出现甚至引发了世界性的战乱。但是,世界的多极化发展终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人们愈益深刻地认识到,世界的和谐就如同生态系统的稳定一样,遵从“多样性导致稳定性”的存在规律,所以,和谐世界与战争侵略、殖民压榨、霸权制裁、零和博弈、单边主义操弄等格格不入,尊重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才是实现世界和谐的前提。通过文化赋能架起从美丽中国到和谐世界的桥梁,就是要充分发挥不同文化和文明体的作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体积淀了人类不同族群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对于应对和解决人类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不仅具有表达自己意向的文化权利,而且也会有实际的贡献。而中国文化和文明通过赋能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检验,能够也应该为建设和谐世界积极赋能。

和谐世界从根本上说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内涵了非常宝贵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可以直接对接建设和谐世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理念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传统生态智慧在形而上的层面强调的是自然的本体意义,化育生命乃其大德呈现,人与天地万物同根同源,天地人为三才,因而“天人合一”既是自然法则也是人文取向。这种形而上的理念转化为人的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就是要求人对自然“应时而禁”“应时而发”“用养结合”,这种传统的生态智慧经过现代知识体系的改造充盈后,不仅可以使支撑建设美丽中国的文化根脉更加“粗壮”,而且也是对和谐世界建设的思想和智慧贡献。走向和平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前提,中国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因为追求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个性和中国精神的充分体现。自古至今,中华民族都是一个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的伟大民族。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谈道: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天生的态

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他们希望的只是和谐中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支配。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也是把追求和谐、维护和平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赓续、优化,而这种赓续、优化必将成为推动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因此,从美丽中国到和谐世界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意义呈现的重要向度。

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能够拯救世界”,尽管这两位思想家的话语言说背景和目的指涉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赞赏美的“对话意义”而不是“独白意义”。美丽中国建设无疑也搭建了一个关于美的对话的实践性平台,既向整个世界发出了共建美、分享美的实践之约,也展示了人类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愿景。使全世界在这种共建共享的活动中展开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友好对话,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过程中能够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33.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1.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4]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687.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163.

[7]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8] 邱明正,朱立元. 美学小辞典(增订本)[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2.

[9]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8.

[1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297.

On the Cultural Mirror Image of Beautiful China: A Discussion on Cultural Empowerment for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LI Peichao^{1,2}, XIONG Yan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is not merely a pure technological project, but more importantly, a significant goal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Beautiful China, at a profound level, is reflected as a cultural mirror image. It embodies multiple connotations, including the beauty of natural ecology, the beauty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 beauty of people’s wellbeing, and the beauty of global harmony. First, the beauty of natural ecology is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wisdom. This wisdom provides a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and must be revitalized in modern contexts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econd, the beauty of green development reli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ulture.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ecological culture has become a hallmark of Beautiful China in the new era, guiding society in fostering a nationwid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ird, the beauty of people’s well-being reflec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By consolidating social consensus and inspir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promotes Beautiful China as a cause co-built and shared by all people. Finally, the beauty of global harmony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Concepts such as “harmony in diversity” and “benevolence and peace” from Chinese civilization offer wisdom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Cultural empowerment opens up a practical field for the complementarity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nd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prosperity. This enables the formation of a sound situation of mutual support among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wisdom, the cultivation and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with distinct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huma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Beautiful China; cultural mirror image; cultural empowerment